

「攻擊性嚇阻」與中共 介入韓戰之根源

Offensive Deterrence and the Origin of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林賢參 (Lin, Hsien-Sen)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

摘 要

本文之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概念性的分析架構「攻擊性嚇阻」，以解釋中共介入韓戰之思考邏輯。此一概念並非憑空臆測，而是源自於以下三項因素：歐美學界所建構的「嚇阻」、「強制外交」之概念，中國古兵書『司馬法』所倡導的「以戰止戰」思想，中共所繼承的馬克斯、恩格斯之「積極防禦」戰爭觀。而其實施要件，也有下列三項：基於「戰爭全局」之思考模式、有限度的軍事攻擊作為、預防戰爭升級之配套措施。認為「現在不打，將來必定挨打」之中共領導人，在「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理念之影響下，做出具有攻擊性的參戰決定。中共參戰之戰略意圖，在於為事先阻止美國在中朝邊境構築入侵中國之前進部署基地。但是，此一參戰決策，則顯然是基於誤判敵我情勢與誤解對方意圖所導致之結果。

關鍵詞：「攻擊性嚇阻」、「三矢向心」威脅、「積極防禦」、「攻擊至上主義」

壹、緒言：問題與目的

中共當局始終堅稱之所以介入韓戰，是因為美國企圖經由朝鮮入侵中國。但令人不解的是，軍力居於劣勢之中共，為何不採取固守中朝國境之「消極防禦」，而選擇跨過鴨綠江進行攻擊之「積極防禦」？

在 1960 年出版的『中國渡過鴨綠江』，被認為是研究中共介入韓戰議題之經典作品。根據作者 Allen S. Whiting 之解釋，中共介入韓戰之行動，是為對應急迫性威脅所實施的『先制攻擊』(preemptive attack)¹。

從 1980 年代後半起，有關中共介入韓戰之大陸資料，以出版中共領導人之年譜或其身邊機要之回憶錄等方式公開。另一方面，自蘇聯瓦解後之 1990 年代中葉起，有關韓戰之蘇聯機密文件，也陸續地以各種方式被公開²。此等新資料之公開，提供了重新詮釋此一議題之機會。

利用大陸資料之郝雨凡與翟志海的共同研究指出，在杜魯門聲明發布後，中共領導人即判斷，未來美國可能從朝鮮、印支、以及臺灣等三個戰線進攻中國，而介入韓戰則是企圖在朝鮮建立橋頭堡。因此，他們決定採取「反擊」措施³。其次，運用蘇聯資料之沈志華研究指出，毛澤東基於以下原因才決定介入韓戰：避免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陷入孤立；避免在中國境內打一場無法避免的中美戰爭；避免蘇聯以中蘇同盟之名派軍進入東北。毛澤東認為，與其坐等美軍跨過鴨綠江，不如掌握有利戰機在朝鮮境內制止戰爭⁴。不過，這兩份文獻只能補強前述 Whiting 之主張，未能提出新的見解。

經過綜合檢討其他相關文獻，可發現以下幾點研究缺失。

第一，忽略了中共對外輸出革命與朝鮮問題之關連性。中共有意協助北韓南侵，但因史達林在幕後主導，以及金日成不歡迎中共介入，以致對開戰計畫無置喙之餘地。

第二，錯誤地將中共之軍事行動定位為「先制攻擊」。中共雖然高喊「三矢向心」威脅，但因為他們已認識到美國無立即入侵中國之準備，並不存在「先制攻擊」問題。

第三，無法對中共捨棄「消極防禦」之決定做出合理的解釋。當時，中共

¹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51-160; idem.,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6, No.2 (Fall 2001), pp.103-131.

² 中文資料有沈志華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上·中·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 7 月初版）。英文資料則可參閱以下網站：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CWIHP), <http://www.gwu.edu/~nsarchiv>.

³ Hao Yufan &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121 (Mar. 1990).

⁴ 沈志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7 月），頁 104-135。

在國內之支持尚難謂堅如磐石，參戰可能招致美國之核武攻擊或支持國府反攻，而一旦戰事延長，不但有拖垮財政之危險，且將造成對蘇聯之長期依賴，因此不介入反而安全。

第四，與第三點相關連，即未能從「攻擊優勢」或「防禦優勢」之觀點，來檢討中共介入之原因。換言之，忽略了中共之「積極防禦」戰略，對參戰決策之影響力。

本文認為，要彌補此等缺失，必須先回答以下兩點問題：中共所追求的國家目標為何？渠等如何實現此等目標，以及排除妨害目標達成之實質性或潛在性的威脅？換言之，此一議題牽涉到中共新政權之國家安全戰略問題。

從建國前夕所提出的「三大決策」⁵即不難看出，中共在建國初期之目標，在於清除資本主義在中國境內與周邊地區之影響力，而其戰略則是利用中蘇同盟為後盾，以支援周邊地區之社會主義革命。當然，對社會主義實施圍堵之美國，即成為主要威脅。在美國介入韓戰後，中共立即進行動員準備參戰，以期摘除美國威脅於萌芽之際。

本文之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概念性分析架構——「攻擊性嚇阻」，以解釋中共介入韓戰之戰略思考。其次，本文透過「過程追蹤」之手法，對於從國共內戰爆發到介入韓戰之過程進行追蹤，以剖析中共介入韓戰之因果關係機制。以下第二節將說明「攻擊性嚇阻」概念之來源、定義以及實施要件。第三節分析中共對美國實施「攻擊性嚇阻」之背景。第四節說明最終導致中共介入之因果關係機制。最後則為結論。

貳、分析架構：「攻擊性嚇阻」

本文所使用之「攻擊性嚇阻」(offensive deterrence) 概念，係參酌以下幾種主張所構成：歐美學界所建構之「嚇阻」(deterrence)、「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以及「有限戰爭」(limited war) 等概念；中國古兵書「司馬法」所闡述的「以戰止戰」概念；馬克斯與恩格斯所主張，「最有效的防禦，仍然是以攻勢來進行的積極防禦」之戰爭觀。

⁵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4。

一、「嚇阻」與「強制外交」

嚇阻與強制外交，是歐美戰略研究學界在冷戰期間，以美國對外政策為對象所建構的概念。此等概念，是用來解釋被認為旨在維持現狀之超級強國美國，以其強大的軍力為後盾，與被認為企圖改變國際現狀之另一個超級強國蘇聯或者是其他中小型國家為對象，所進行的外交角力與討價還價之手段。

A.L. George 對嚇阻作如下之定義：讓嚇阻對象理解到其計畫採取的行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將超過其可能獲得的利益之作為，它是透過武力威脅，對嚇阻對象形成決策壓力之心理戰⁶。此外，T.C. Schelling 則表示，為了阻止對手進入己方之紅線，可以採取自斷退路或在對方行進路線設置「引爆裝置」(trip wire)以示嚇阻決心⁷。簡言之，嚇阻是由實現威脅之力量，動用此一力量之決心，以及嚇阻對象對前兩者之評估結果等三要素所構成。

根據 R. Ned Lebow 之研究表明，以下四點是成功的嚇阻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將嚇阻之目標明確化；清楚地讓嚇阻對象知道嚇阻承諾之存在；具有實現嚇阻承諾之能力；讓嚇阻對象確認其遵守承諾之決心⁸。不過，即使嚇阻之訊息正確傳達出去，如果被對方認為是在虛張聲勢，或者是嚇阻目標關係到對方之核心利益，嚇阻即可能失敗。

嚇阻失敗後，防禦者可能採取強制外交。根據 George 之定義，它是一種意圖推翻對手所製造出新現狀之嘗試，為了說服對方退讓，透過武力威脅或象徵性地行使武力，以向對方傳達「為了證明保衛本身利益之意志，必要時將會進一步使用足夠的軍事力量」之訊息⁹。

因此，無論是嚇阻或強制外交，主要是透過武力之威脅，以影響對手之決策或行動。不過，對於並未擁有足夠執行懲罰或報復能力之弱國來說，當其對象擁有較強軍力時，其威脅之可信度不高。因此，要將此一強國戰略適用在弱國之對外戰略，在概念上仍須稍作修飾。

二、「以戰止戰」與「積極防禦」

⁶ G.クレイグ/A.L.ジョージ(木村修三他譯)，軍事力 現代外交(有斐閣，1997年)，頁204。

⁷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87.

⁸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2-90.

⁹ Alexander L. George & William E. Simons edited,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p.7-8.

彭德懷曾表示，中共介入韓戰是發揮「以戰止戰」精神，以及「積極防禦」戰略之實際運用¹⁰。根據『司馬法』之解釋，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制止戰爭」，「即使發動戰爭，也是可以的」¹¹。而「積極防禦」，則是源自於前述馬克斯與恩格斯之戰爭觀，被中共奉為最高軍事指導原則。

以現代戰略之用語來形容，「以戰止戰」，是一種以發動小規模衝突，來防止爆發大戰或改變對本國不利的戰略形勢之手段。基本上，此一手段具有防患未然之性質。P. Huth 與 B. Russett 指出，防禦者在對應威脅時，不必然只會採取純粹性的防禦措施，也許他們會採取攻擊性的主動措施。在此一情形下，防禦者自認為本身所採取的攻擊行動，是防衛本身利益之正當措施¹²。

其次，R. Jervis 指出，為了強化國防安全，國家具有利用包括武力在內之強制手段，在本國周邊建構國防緩衝地帶之傾向¹³。此一具有攻擊性與侵略性之行動，係源自於對外來威脅之恐懼感。此一思考邏輯，構成中共對外輸出革命之理論基礎。中共認為，為了鞏固新政權之安全，必須排除盤據中國周邊地帶之帝國主義勢力。他們相信，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戰爭。

根據共軍研究員之說法，毛澤東在繼承馬克斯主義有關「積極防禦」之基礎上，建構出自身的「積極防禦」¹⁴，並將其定義為「攻勢防禦」¹⁵。在此一戰略指導下，中共有可能為捕捉有利戰機與掌握戰爭之主導權而先發制人¹⁶。T.R. McCabe 即指出，中共之「積極防禦」，係企圖透過包括「先制攻擊」在內之戰術性攻擊，來達致其戰略性防禦目標。不過，其目的不在於占領對方領土，而是為妨礙對方達成目標並迫使其進行戰略轉換¹⁷。當中共堅信其行動為「防禦」時，即存在著主動挑起衝突之可能性，介入韓戰即是一個明顯例證。

¹⁰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編，*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587。

¹¹ 王雲路注釋，新譯：*司馬法*（臺北：三民書局，1996年2月），頁5。

¹² Paul Huth & Bruce Russett, "Testing Deterrence Theory: Rigor Makes a Difference," *World Politics*, Vol.42, No.4 (July 1990), p.487.

¹³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January 1978, pp.167-214.

¹⁴ 夏征難，*毛澤東與中外軍事遺產*（大連：大連出版社，1997年7月），頁208-209。

¹⁵ 毛澤東選集編集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1卷）（日文版，下同）（外文出版社，1972年），頁289-292。

¹⁶ 李德福、蔡仁照，*博大精深的兵學寶庫：毛澤東的軍事觀*（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3年），頁175。

¹⁷ Thomas R. McCabe, "The Chinese Air Force and Air and Space Power,"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Fall 2003, <http://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apj/apj03/fal03/mccabe.html>.

由此觀之，中共之「積極防禦」具有「攻擊至上主義」(cult of offensive)之理念。此一理念，正是構成「攻擊性嚇阻」之理論基礎。

其次，毛澤東分析戰爭問題與決定戰略選項優先順序之參考基準的「戰爭全局」概念，也與「攻擊性嚇阻」具有密切關聯¹⁸。日本學者伊藤憲一指出，「戰爭全局」與毛澤東之「矛盾論」相關，是綜觀全局而不侷限於局部，找出主要敵人或主要矛盾之所在，在不浪費資源之情形下，集中全力予以擊破之原則¹⁹。在此一思考模式下，毛澤東認為將來無可避免的中美戰爭，是關係到政權存亡之「全局」，而朝鮮戰場之勝負，則是影響此一「全局」之關鍵性「局部」。基於此一判斷，在美軍介入韓戰之後，毛澤東即開始構思「攻擊性嚇阻」之計畫。

三、「攻擊性嚇阻」之實施要件

根據以上論述，本文對「攻擊性嚇阻」作如下定義：在「戰爭全局」思考模式下，決策者期待透過對已出現之 A 事態採取有限度的「戰術性強制」，以達到在戰略上防止被其認為可能從 A 事態衍生出危害其安全 B 威脅發生之「戰略性嚇阻」。

Jack Levy 指出，大國為了明確表達其決心，並強化嚇阻對手侵犯其核心利益之敵對行動，可能採取介入小規模戰爭之政策選項。換言之，在事態出現惡化之前，國家領導人會以引發小規模戰爭來展現其不退讓之決心，並藉此將可能引發大戰之風險降至最低²⁰。如果將此一模式，套用在中共介入韓戰之決策，即形成以下之論述：中共將美國介入韓戰視為是入侵中國 (B 威脅) 之前哨戰 (A 事態)，遂決定跨過鴨綠江對美軍展開奇襲。從戰術層面上而言，此一軍事行動是要迫使美軍撤離朝鮮之強制。但是，從戰略層面上來看，則是一種迫使美國放棄經由朝鮮入侵中國之嚇阻。

處於相對軍事劣勢之國家，以武力威脅進行嚇阻時，其可信度並不高。而此處之「戰術性強制」，即是為提高嚇阻可信度之措施。不過，要實施「攻擊性嚇阻」時，必須先確認對方在現階段並無意進行大戰之後，才能操作此一

¹⁸ 華劍橫主編，毛澤東戰略思想研究（雲南：成都出版社，1989年），頁256-257。

¹⁹ 伊藤憲一，國家戰略（中央公論社，1986年），頁142-155。

²⁰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 (October 1987), pp.82-107.

「危機邊緣」策略。否則，可能因對手報復或誤解而引發雙方都不願意發生的大戰。

Schelling 指出，「小規模戰爭蘊含著較大規模戰爭之威脅，它不單只是軍事戰鬥，也是一種『危機外交』」²¹，而此一「危機邊緣」策略，被當作是威脅裝置在使用²²。其中，「有限戰爭」被當作是引爆大戰之啟爆裝置，扮演著嚇阻進行之侵略繼續進行或阻止大戰發生之措施²³。此處 Schelling 所指的「有限戰爭」功能，與本文之「戰術性強制」相同。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要實施「攻擊性嚇阻」，必須要具備以下三項要件。

第一，由 A 事態聯想到 B 威脅出現之「戰爭全局」的思考模式。受此一思考模式之影響，領導人動輒將與本國有關之 A 事態，視為是以本國為對象 B 威脅之前兆，在處理 A 事態時，其行使武力之門檻會降低。

第二，在敵強我弱之情形下所採取的「戰術性強制」。由於擔心在 A 事態上所實施之威脅可信度遭到質疑，因此為提高其可信度而採取有限度的軍事行動。這一點也說明了有意避免戰爭之領導人，卻往往擺出好戰姿態之原因。

第三，在確認對方無意進行大戰後，發動「攻擊性嚇阻」的一方，必須同時採取預防衝突擴大之配套措施，以便向對方傳達本身無意擴大戰爭，以避免將對方逼到牆角而引發反效果。

但是，問題在於，如何才能讓對方理解到己方無意擴大戰爭之訊息呢？本文擬借用 R.E. Osgood 之「有限戰爭」概念，做為防止衝突升高之措施。

Osgood 指出，所謂「有限戰爭」，即是「交戰國雖然是為具體而明確的目標在相互交火，但是卻不願意盡軍事上之最大努力，並且將軍事行動限定在可透過交涉來對戰爭目標進行妥協程度之戰爭」²⁴。為避免戰爭升高，Osgood 提出以下三點措施：限制戰爭的目標，並且讓對手了解；限制戰爭的規模，讓其規模符合戰爭目的；保持可以透過交涉以結束戰爭之管道²⁵。

誠如藍德公司 (RAND) 之研究所言，相對弱勢的國家在操作危機時，為

²¹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op.cit., p.33.

²² *Ibid.*, pp.99-103.

²³ *Ibid.*, pp.105-107.

²⁴ Robert E. Osgood, *Limited War: 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 Strate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2.

²⁵ *Ibid.*, p.24.

了避免對方超乎想像之反彈而導致衝突擴大，其武力攻擊不能超過對方所能忍受之強度²⁶。因此，如何在實施強制行動時，既能夠以升高危機來達到嚇阻之目的，亦能夠踩住煞車避免引發意想不到的大戰，是實施「攻擊性嚇阻」時所必須優先處理的課題。

參、中共展開「攻擊性嚇阻」之背景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大都是未曾與歐美國家有過接觸經驗，且又親身體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民族仇恨。同時，他們還是馬列主義信徒，矢志要在中國與全世界消滅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²⁷。由於受到日趨繃緊的美蘇冷戰國際格局之影響，日本投降後所爆發的國共內戰，呈現出「美國與國民黨」對抗「蘇聯與中共」之構圖。

在此一構圖影響下，中共將美國定位為頭號敵人，而蘇聯則是對抗美國之夥伴。此一敵友定位，決定了中共政權向蘇聯「一邊倒」，以及在中蘇同盟架構下進行軍事現代化、對外輸出革命之國家安全戰略。不過，中共增強本身安全之舉動，卻繃緊了其與美國間之「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日本學者土山實男指出，陷入「安全困境」之領導人，「由於對戰爭之不安，會出現對於防禦戰略之可行性，或者是採取攻擊所應付出的代價作出過低評估。但相對地，卻會對於實施攻擊之益處，爆發戰爭之必然性，以及遭到攻擊之可能性作出過高評估之傾向」²⁸。

一、反美親蘇之敵友定位

1945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第7屆黨大會上表示，「戰後趨勢，美國一定反蘇，蔣介石一定反共。我們需要蘇聯，蘇聯也需要我們」²⁹。毛澤東判斷，史達林除了支持中共以確保在中國之權益外，已別無其他選擇餘地³⁰。

²⁶ Mark Burles and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60/>.

²⁷ Jonathan R. Adelman & Chih-yu Shih,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3, p.172.

²⁸ 土山實男，安全保障 國際政治學：焦 傲（有斐閣，2004年），頁119。

²⁹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12月），頁205。

³⁰ 同前註，頁206。

歷史學者陳永發指出，毛澤東為因應美蘇冷戰格局下之國共對立，擬定了兩條戰線。一是分化美蔣關係以減少美國對國民黨之援助，二是取信蘇聯以擴大其對中共之援助³¹。1946年初，周恩來對來華調停國共關係、並質疑中共偏向蘇聯之美國特使馬歇爾表示，「我們的傾斜程度，端視美國之對華政策而定」³²，其牽制美國之意圖明顯。

但是，為何在內戰爆發後，中共卻公然視美國為頭號敵人？S.M. Goldstein 指出，導致中共政策轉向之關鍵有以下兩點：美國將戰後剩餘近 10 億美元之武器，以低價賣給國民政府；美軍第 7 艦隊司令 C.M. Cooke 公開表示，美國海軍將持續駐留中國。中共將此視為美國有意介入內戰之徵兆。為此，中共立場鮮明地擺出反美姿態，以拉攏蘇聯對抗美國³³。

實際上，在內戰全面爆發前，蘇聯對中共之援助即已在秘密進行。9月14日，占領東北之蘇聯遠東軍派員赴延安向中共表示，只要不使用八路軍名義、避免與蘇軍接觸，渠等將不干涉共軍進入東北。據此，中共於同月17日，決定「向南防禦、向北發展」方針，並下令軍政人員迅速轉進東北³⁴。迄1946年2月底止，中共已在東北建立了人數多達31萬餘名、擁有大炮與坦克等重型武器之部隊³⁵。根據蘇聯之內部報告指出，迄1948年底為止，蘇聯總計移交了接收自日本關東軍可裝備70餘萬大軍之武器彈藥給中共³⁶。

對於蘇聯之援助，毛澤東投桃報李，於1949年6月30日發表「人民民主獨裁論」，除了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外，還指控美國幫助蔣介石殺害數百萬中國人，將今後中共與美國之鬥爭定位在「零和遊戲」關係³⁷。8月初，杜魯門政府發表「中國白皮書」。對此，毛澤東自8月14日起，接連發表5篇文章，批判美國對華政策之本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³⁸。

³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70年（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12月），頁392-393。

³²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頁151。

³³ Steven M. Goldste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s, 1944-1950," Dorothy Borg &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 1947-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51.

³⁴ 同註18，頁222-224。

³⁵ 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1.

³⁶ Andrei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No.2, 1995, p.79.

³⁷ 毛澤東選集編集委員會，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2年），頁539-560。

³⁸ 同前註，頁561-606。

二、蘇聯之軍事援助與中蘇同盟

1949 年 9 月 21 日建國前夕，毛澤東在第一屆「政協會議」致開幕詞時，闡述由以下三個途徑所構成的新政權之國家安全戰略：保障與強化中共一黨獨裁體制之「人民民主專政」；重視與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之合作；發展與建設強大的陸海空三軍戰力³⁹。

在「政協會議」召開前的 7 月初，朱德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為了建設進攻臺灣之空軍，應選拔留學生赴蘇聯接受空軍訓練⁴⁰。數日後，毛澤東致函周恩來表示，「我們必須準備攻臺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與空軍。...（中略）可以考慮選派 3、4 百人去遠方學習 6 至 8 個月，同時購買飛機 100 架左右，連同現有的飛機，組成一支攻擊部隊」⁴¹。當時正在莫斯科訪問的劉少奇，於 7 月 11 日，在與史達林會談時，表達希望蘇聯秘密出動海空軍協助攻取臺灣與香港之請求。但是，史達林認為此舉有引發美蘇大戰之虞，而婉拒劉之請求⁴²。

7 月 26 日，毛澤東拍發電報給劉少奇，希望其向蘇聯提出協助中共建設空軍，以及將派遣負責空軍建設之劉亞樓赴蘇聯進行協議之要求。8 月 13 日，劉少奇率同抵達莫斯科之劉亞樓等人，與蘇聯空軍元帥 A.M.Vasilevskii 進行會談。18 日，雙方達成以下共識：蘇聯同意協助中共，在中國境內設置 4 所戰鬥機與 2 所轟炸機之飛行員訓練學校，並且預計在一年之內培養 350 名飛行員；蘇聯同意出售中共 434 架飛機，並且派遣 878 名技術維修人員赴中國⁴³。

其次，關於中共海軍建設問題，蘇聯承諾將協助中共在旅順創設訓練海軍之學校，以及援助中共建設沿岸防衛之相關設施，並接受負責籌建中共海軍之張愛萍赴莫斯科訪問⁴⁴。9 月下旬，張愛萍抵達莫斯科，與蘇聯軍方進行協

³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342-346。

⁴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6 年），頁 330。

⁴¹ 徐焰，臺海大戰 上篇：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1995 年 9 月），頁 11。

⁴² S.N. Goncharov, "Interview: Stalin's Dialogue with Mao Zed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X, No.4 (Winter 1991-92), pp.45-76.

⁴³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75-77.

⁴⁴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頁 408。

議。協議結果，蘇聯同意派遣軍事顧問至中國大陸協助中共建設海軍⁴⁵。

此外，於 12 月初啟程赴莫斯科訪問之毛澤東，於 16 日，在首度與史達林會談時，再度要求蘇聯祕密派遣海空軍協助進攻臺灣，但仍遭到史達林拒絕。不過，史達林同意提供海空軍裝備，以及必要的作戰參謀與訓練教官⁴⁶。關於支援中共建設海軍問題，史達林則表示，蘇聯「可以在旅順支援訓練中國的海軍幹部。你們出人，我們出船。學會操作技術的中國海軍幹部，可以直接把這些船開回中國」⁴⁷。

其後，毛澤東以繼續提供旅順軍港之使用權，換取蘇聯之軍事援助與對美國之嚇阻力⁴⁸。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蘇雙方締結同盟條約。據『當代中國外交』指出，「美國之所以沒敢放手地把朝鮮戰爭擴大到中國的因素之一，是考慮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存在」⁴⁹。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正因為有中蘇同盟做為後盾，中共才敢大膽地向周邊地區輸出革命⁵⁰。

三、輸出革命以強化安全

根據 S.M. Walt 之研究表明，革命領導人通常具有不安與過度自信之雙重心理狀態。在取得政權後，革命領導人擔心外國勢力可能趁機謀取不當利益，或協助國內反革命勢力進行顛覆。此一不安，導致他們傾向採取攻勢以補強新政權之脆弱性。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強化國內之支持與擴大對周邊地區之影響力。另一方面，由於國內革命成功之經驗，讓革命領導人產生，在未來的對外戰爭亦能獲勝之過度自信。也因為如此，他們可能會對外國勢力實施「先制攻擊」，以預先消除反革命勢力反撲之危險⁵¹。

根據 S.N. Goncharov 等人之共同研究指出，「毛澤東之革命夢想，是奪回過去中國在世界上之地位，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此一夢想。毛澤東深信，重建過去中華帝國所擁有的力量與地位，是他所肩負的歷史性使命」⁵²。如果此一論

⁴⁵ 中國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年譜 1926-1958（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782。

⁴⁶ “Talks With Mao Zedong, December 1949—January 1950, And With Zhou Enlai, August—September 1952,” Document I, CWIHP/BULLETINS/b6-7a1.htm.

⁴⁷ *Ibid.*.

⁴⁸ 金沖及主編，劉俊南·譚佐強譯，周恩來傳 1949 - 1976（上）（岩波書店，2000 年），頁 33。

⁴⁹ 同註 5，頁 27。

⁵⁰ Chen Jian, *op.cit.*, p.121。

⁵¹ Stephen M. Walt, *Revolution and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2.

⁵² S.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 Stalin, Mao ,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

述成立，毛澤東政權成立後之首要目標，是奪取對周邊地區之影響力。日本學者岡部達味亦指出，由於毛澤東等人具有「在本國周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將對安全具有極大益處」之想法，所以「中國在那段期間，對推動周邊國家之革命相當熱心」⁵³。

1949 年 7 月 27 日，史達林在舉行歡迎劉少奇代表團的酒會上，針對今後之革命形勢與中蘇兩國之革命分工，做如下之表明：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由西方向東方移動，現在又往中國與東亞方向移動。在世界革命運動當中，中蘇兩國負有更大的責任。今後，由中方負責協助東方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之革命，而蘇聯則負責支援西方革命運動之責任⁵⁴。

在中共正忙於籌備建國大典之 9 月間，胡志明派人赴北京，要求中共援助其抗法戰爭⁵⁵。其後，劉少奇要求胡志明派遣高級代表團赴北京，以便商議援助事宜。1950 年 1 月底，胡志明本人密訪北京⁵⁶。30 日，劉少奇召集黨內高幹與胡志明進行會談。會後，胡志明在中共之協助下，由北京轉赴莫斯科。當毛澤東代胡志明請求蘇聯援助越南時，史達林表示，「中國與越南地理靠近，聯繫較多，由中國去幫助較為方便... (中略)。我們已經打完世界大戰，大量的武器裝備用不著，可以把它運到中國去，有些越南適用的，你們當然可以運一些到那裡」⁵⁷。

毛澤東在結束訪蘇行程、並帶同胡志明返抵北京後，隨即召集黨內討論援越事宜，會後達成以下共識：越南民族解放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共有責任予以支援和幫助，這也是鞏固中國革命勝利、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包圍所需要的⁵⁸。3 月 14 日，劉少奇起草對黨內之指示文稿指出：「我們在革命勝利以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4.

⁵³ 岡部達味，中國對外戰略（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 年），頁 62-63。

⁵⁴ 同註 44，頁 412。

⁵⁵ 文衍編著，超越對抗：中美 3 次大衝突（中冊）（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1027-1028；

錢江，在神秘的戰爭中：中國軍事顧問團赴越南征戰記（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7-8。

⁵⁶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 1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86-187。

⁵⁷ 編輯組，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實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22-23。

⁵⁸ 同前註，頁 244。

際範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⁵⁹。

四、中共之不安與過度自信

Ernest R. May 指出，「決策者經常引用對過去事件之類推，來處理眼前的問題。在評估未來動向時，會與過去的歷史進行比較或以本身所經歷之體驗作為依據」⁶⁰。但是，有不少決策者在借用歷史經驗時，卻忽視了時代背景與客觀情勢之不同，而未能作出正確的情勢判斷⁶¹。

姑且不論冷戰之意識形態對立，單從國境相毗鄰之地政學觀點來看，毛澤東對於將導致東北亞區域均勢發生變化之北韓南侵計畫，是不可能充耳不聞的。在內部檢討是否參戰之中，主戰派領導人表現出前述 Walt 所描述的不安與過度自信。此處所指之不安，係指他們擔心一旦北韓部隊敗退，將導致中共必須直接面對美軍逼近鴨綠江畔之焦慮。而過度自信，則係指在面對前述威脅時，憑仗著在內戰期間以弱勝強打敗國府軍隊之經驗，他們認為在未來與美軍交鋒時，亦能取得勝利之自負心態。

當美國總統杜魯門於華府時間 6 月 27 日上午，發表包括美軍介入韓戰、第 7 艦隊進入臺海巡弋、軍事援助法屬印支半島，以及強化對菲律賓之防衛協助等內容之聲明時，中共反應激烈，認為該聲明暴露出美國企圖從朝鮮、臺海以及印支等三個方向入侵中國之陰謀，「這三個方向當中，不用說，朝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美國在完成對朝鮮之侵略後，他們的刀子就可以刺入中國的心臟。美國在東方之侵略計畫，是日本軍國主義早已經實施過的『北進主義』與『大陸政策』之翻版」⁶²。

誠如 E.R. May 所言，援引歷史的經驗教訓，是決策者正當化其決策之過程。中共提出「三矢向心」威脅論之目的，在於透過將美國介入韓戰之行為類比為日本侵略中國，以煽動人民支持「抗美援朝」，並正當化對美戰爭之決策。Jack Snyder 指出，「當深信對方具有強烈敵意時，完全解除對方武裝是防止其攻擊自己的最好方法之念頭，即會如影隨形地揮之不去」⁶³。在美中互不

⁵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頁 245。

⁶⁰ アーネスト・メイ著，進藤榮一譯，歷史 教訓（岩波書店，2004 年），頁 iii。

⁶¹ 同前註，頁 iv。

⁶²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頁 685-689。

⁶³ Jack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信任、敵對意識高漲之狀況下，中共領導人認為，透過行使武力以解除美國在朝鮮等周邊地區之武裝，才是確保其國家安全之上策。

8 月中旬，雖然北韓攻勢出現遲緩現象，但毛澤東卻依然保持樂觀。毛在 8 月 19 日與後來出任蘇聯駐北京大使之 P.F.Judin 談話時表示，美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以目前的兵力規模繼續作戰，最後是被趕出朝鮮。第二條是，追加派遣 30-40 個師的兵力。在後者之情形下，中國直接介入是必要的。如果中國介入打敗美國，就能夠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爆發⁶⁴。在美軍登陸仁川後，毛澤東依然認為，因為美國還沒準備好長期在朝鮮進行大戰，他們有可能以妥協的方式來結束戰爭⁶⁵。

不過，朝鮮戰局之演變，超乎毛澤東之預想。10 月 1 日，南韓部隊開始越過 38 度線北進。在聯合國大會於 7 日通過統一朝鮮之決議案後，美軍先頭部隊亦於 9 日開始跨過 38 度線。但諷刺的是，美軍跨過 38 度線之行動，剛好成為正當化中共介入韓戰之有力佐證。

肆、中共介入韓戰之根源

對中共新政權而言，最重要的是儘快恢復國民經濟體系，以穩定社會秩序。即使他們認為與美國終究難免一戰，但也是希望儘可能地延遲其爆發。只因為金日成過早地將統一朝鮮構想付諸行動，才會導致中美戰爭之爆發，比中共領導人所預期的要來得快。

不可否認的是，美國之所以重新檢討對亞洲政策，主要是對中蘇合作輸出革命之憂慮，而杜魯門聲明則是其檢討結果。同樣地，就是因為有杜魯門聲明之發表，才會有「三矢向心」威脅論之登場。在此一威脅認知下，中共在戰火未延燒到自家門前，即決定跨出國境進行「滅火」。而導致中共最終做出介入韓戰決定之原因，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輸出革命與圍堵政策之衝突

Summer 1984 (Vol.9, No.1), pp.108-146.

⁶⁴ 和田春樹，朝鮮戰爭全史（岩波書店，2002 年），頁 178。

⁶⁵ A.V.トルクノフ著，下斗米伸夫・金成浩譯，朝鮮戰爭 謎 真實：金日成、毛澤東機密電文（草思社，2001 年），頁 166-167。

造成美中敵對關係之根本原因，在於中蘇兩國對外輸出革命與美國對此進行圍堵之結果。杜魯門政府將防止社會主義擴散，視為其國家安全戰略之核心目標。因此，中蘇對朝鮮與印支輸出革命，當然會引發美國之不安，並摸索構築防衛線。但是，美國所採取的安全措施，則又變成導致中共不安之因素。

從此一觀點看，美中兩國之對立，係源自於雙方在安全戰略上之惡性競爭。自 1950 年初起，美中雙方開始競逐中國周邊區域之優勢以確保安全，但也因此而加深彼此之不安。由於兩大陣營在安全政策上之對立日趨嚴重，讓美中都深信朝鮮均勢之變動，是關係到本身安全之重大事態，最後導致雙方先後介入之悲劇。

誠如前述，中共領導人企圖與蘇聯合作，將社會主義擴散到周邊地區，以確保新政權之安全與影響力。此一戰略構想之背後，存在著「以夷制夷」之權謀術數。毛澤東曾將美蘇冷戰比喻為「紅老虎」與「白老虎」之對峙，認為中共應該活用美蘇之矛盾。共軍研究員徐焰認為，介入韓戰之決策，即是基於此一思考之結果⁶⁶。由於毛澤東等人認知到，渠等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勢必引起與美國之對立。為了增強對美鬥爭之力量，他們對內煽動美國威脅以提高人民之向心力，對外則建構共同推動革命之中蘇同盟架構。

另一方面，自 1949 年後半以來，美國接連受到喪失獨占原子彈之優勢與「喪失中國」之打擊。在此一情勢下，美國重新檢討 G.F. Kennan 以來所推動的有限度圍堵政策。杜魯門政府內部原本對協助防衛法屬印支之態度消極，但因中蘇介入印支，才讓他們認知到革命浪潮，已經開始衝擊印支並可能波及到整個東南亞。因此，在中蘇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後，美國立即改變初衷，於 2 月 7 日給予在法國扶植下所成立的印支三國之外交承認，摸索協助法國防衛印支⁶⁷。

而國務卿艾奇遜於 3 月 15 日在舊金山之政策演說中⁶⁸，更是一改過去避免刺激中共之態度，口氣強硬地警告中共，不得威脅美國在亞洲之利益。對

⁶⁶ 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正確而輝煌的運籌帷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頁 113。

⁶⁷ 白石昌也「第 1 次インドシナ戦争とジュネーブ會議」，山極晃編著，東亞冷戰（三嶺書房，1994 年，第 3 部第 3 章）。

⁶⁸ 佐佐木卓也，封込 形成 變容： 、 、 政權 冷戰戰略（三嶺書房，1993 年），頁 215。

此，周恩來則發表聲明反駁，強調「亞洲人民的問題，應該由亞洲人民自己來處理，不管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應該讓位於太平洋彼岸，類似艾奇遜那樣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來干涉」⁶⁹。

在杜魯門政府內部對社會主義擴張感到不安並尋求補強措施之際，北韓發動對南韓之全面攻擊，讓美國立刻作成介入之決定。同樣地，美國之介入韓戰，也增強中共之不安，為了消除此一不安，毛澤東亦早就下定決心介入。此種增強本身安全之惡性循環，構成引爆雙方戰爭之因果關係。

二、預防性動機與重視攻擊之傾向

有許多研究認為，由於中共自認其是美國的下一個目標，在戰爭無可避免之危機意識驅動下而先發制人。但是，共軍在美軍接近鴨綠江之前，即已秘密進入北韓境內伺機攻擊之舉動，並不符合「先制攻擊」要件。而中共所稱「自衛反擊」之說法，更是欠缺說服力。

當杜魯門聲明發表後，認為美中戰爭無可避免之毛澤東等人，在北韓軍隊勢如破竹南下之際，即開始研擬進入朝鮮趕走美軍之作戰計畫。於 8 月 14~15 日召開的「瀋陽軍事會議」上，高崗代表中共中央向參戰部隊說明參戰理由時，曾作如下之表示：如果美國占領北韓，一定會準備力量來進攻我們。而我們選擇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是比較有利的。為了保衛祖國、鞏固勝利、粉碎帝國主義的侵略計畫，我們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立民主統一的國家⁷⁰。

其次，彭德懷在參戰部隊出動前夕之 10 月 16 日，召集師級以上幹部講話時，表明其贊成參戰之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我們不出兵支援朝鮮，將會讓國內外之反動派氣焰高漲，親美派會更加活躍。如果北韓被美國占領，將對我們造成直接威脅。美國即有餘力派兵到越南或緬甸，在世界各地發動戰爭。屆時，我們將陷入被動，對國防與國境安全極為不利。

第二，現在不打，3、5 年後還是要打。但是，那個時候，我們辛苦建設起來的工業將會遭到破壞。其次，因為美國在武裝西德與日本，讓我們的戰爭

⁶⁹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8-10。

⁷⁰ 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抗美援朝戰爭史（第 1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年 9 月），頁 91-92。

更難打。因此，現在就打，也許比較有利。

第三，中國革命勝利後，世界革命勢力占優勢。如果不積極援助反對侵略者之鄰國，將會讓世界革命勢力洩了氣。在 3、5 年之內要把國防工業搞起來，是不可能的。陸海空軍的裝備，也不會有特別的改善。因此，還是早打的好⁷¹。

而反對參戰之林彪，則提出「出而不戰」之構想，建議將共軍預先部署於北韓境內，以嚇阻美軍跨過 38 度線，在未受到攻擊之前不進行主動攻擊。對此，周恩來以下列理由，駁回林彪之提案。

第一，從軍事面的觀點來看，積極進行攻擊是較好的防禦。

第二，防衛中朝國界鴨綠江沿岸，需要部署龐大兵力與鉅額的國防預算。

第三，中美戰爭早晚要發生，晚打不如早打。

第四，既然美國已決定從朝鮮等三個方向進攻中國，我們應該選擇在對我軍作戰最有利之朝鮮加以反擊。因為朝鮮地形山多，不利美軍機械化部隊作戰。而且朝鮮與中蘇兩國陸地相連，我軍容易取得蘇聯之武器彈藥，在後勤補給上沒有問題⁷²。

由此觀之，中共領導人認為，與其置重兵於鴨綠江畔等著挨打，不如跨出國境把美軍趕下海來得有利。為防止美國在中朝國境附近構築入侵基地，中共做出秘密動員、準備作戰之決定。此一決定，明顯具有預防性動機與重視攻擊之傾向。

誠如 S. Van Evera 所言，信奉「先制行動占優勢」(first-move advantage) 之決策者，通常具有採取慎重態度以隱蔽自己的軍事力量與戰爭計畫，以利對敵方展開奇襲之傾向⁷³。證諸前述中共領導人之內部談話，以及秘密動員等行動，中共介入韓戰之戰略構想，具有鮮明的「先制行動占優勢」以及「攻擊至上主義」色彩。

三、對「戰略上·體制上之脆弱性」不安

根據「攻擊·防禦均勢」理論 (offense-defense balance) 之解釋，在難以

⁷¹ 同註 10，頁 320-324。

⁷² 李豫編著，毛澤東與共和國元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81-82。

⁷³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7-39、47-49.

用武力征服之「防禦優勢」(defense dominant) 的世界，來自外界之威脅較弱，國際關係也較穩定。反之，在容易以武力征服之「攻擊優勢」(offense dominant) 的世界，國家為強化國境防衛，較容易走向對外擴張⁷⁴。無法在國境阻擋敵國進攻的國家，會採取預先摘除潛在威脅之攻擊戰略，或是為了有利於國境防衛而採取確保國境緩衝地帶之擴張政策⁷⁵。Robert Jervis 即指出，攻擊占優勢時，攻擊容易被視為最有利的防禦手段，即使是防禦者，也會像侵略者一樣採取攻擊行動。

此一有關攻擊與防禦之思考邏輯，適用於解釋中共介入韓戰之決策。如前述，中共認為，與其在難以防禦之鴨綠江沿岸置重兵防禦，倒不如跨江攻擊來得有利。因此，中共才會在北韓軍隊勢如破竹南下之際，即下令動員準備戰爭，並多次向史達林與金日成表達出兵之意願。

除了「戰略上之脆弱性」外，中共還存在著國內政治「體制上之脆弱性」。韓戰爆發當時，中共政權建立未滿週年，大陸內部之反共勢力尚未完全剷除，國府仍企圖反攻。值此之際，一旦北韓被美國消滅，將會鼓舞反中共勢力，進而威脅到政權之穩定。此等戰略上與政治體制上之雙重脆弱性，加深了毛澤東等人之不安。

8 月 26 日，周恩來在檢查參戰準備之國防會議上，即曾表達以下對美軍介入韓戰之不安⁷⁶。

第一，美國企圖在朝鮮打開社會主義陣營的缺口，在亞洲建立發動世界大戰之基地。

第二，美國如果把朝鮮壓倒，接下來他將會對越南等殖民地國家動手。

第三，如果北韓被美國打倒，東北就不安全。中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而東北的工業半數在南部，都是在美國空軍的轟炸範圍之內。

其次，彭德懷於 10 月 5 日與毛澤東見面時，亦表達了相同憂慮。他說，如果不連想到美軍逼近鴨綠江所衍生之危險性，不但北韓政權會垮台，中國東

⁷⁴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January 1978, pp.167-214.

⁷⁵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No.4 (Summer 1995), pp.660-691。

⁷⁶ 中央文獻出版社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43-50。

北亦將面臨直接威脅。如果讓美國占領整個朝鮮，將對我國造成很大的威脅。就像過去日本一樣，利用朝鮮當跳板，於占領東北之後再大舉向內陸進犯。因此，彭認為不能無視於這個歷史教訓⁷⁷。

而毛澤東在 10 月 13 日，發給密訪莫斯科之周恩來的電報上表示，「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不利」⁷⁸。毛澤東所憂慮的是，北韓政權垮台所引發對於政治上之不利影響、東北暴露在美軍之直接威脅、以及對應此一威脅所需國防預算對財政之擠壓等問題。T.J. Christensen 即指出，美軍突破 38 度線所造成的中共對東北防禦之「戰略上脆弱性」，以及革命勢力出現「骨牌效應」(domino) 之恐懼感，正是中共下定決心介入的原因之一⁷⁹。

綜觀上述，中共領導人充分顯現出渠等具有「現在不打，將來必定挨打」之「攻擊至上主義」理念。再加上，他們還認為，美國介入韓戰是過去日本侵略中國之翻版。因此，為了防患於未然，並消除來自於本身脆弱性之不安，中共選擇了攻擊戰略選項，拒絕與美國隔著狹窄的鴨綠江和平相處。

四、攻擊性的同盟關係

Van Evera 之研究表明，第一次大戰爆發前，存在於歐陸之「三國同盟」與「三國協商」兩大同盟體系，具有不管同盟國之行為係基於防禦或攻擊，同盟的另一方均會給予無條件支持。因此，一個小紛爭即把整個歐洲都捲入戰爭⁸⁰。

1949 年 5 月初，在金日成派員向中共要求提供朝鮮族部隊時，毛澤東不但同意其要求，還希望武力統一朝鮮能在中共協助下進行。根據陳兼之研究指出，中共總共提供了 5~7 萬名部隊及其武器裝備給北韓⁸¹。毛澤東在 1950 年 3 月底，與北韓駐北京大使李週淵會談時表示，以和平的手段是不可能統一朝鮮的，只能憑仗武力來解決，不用擔心美國人，他們不會為了這麼小的領土而

⁷⁷ 張希，「彭德懷受命率師抗美援朝的前前後後」，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和決策內幕(上)(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頁 65-108。

⁷⁸ 同註 39，第 6 卷，頁 103-104。

⁷⁹ T.J. Christensen, "Threats, Assurances, 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 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2 (Vol.17, No.1), pp.122-154.

⁸⁰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1 (Summer 1984), pp.58-107.

⁸¹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op.cit.*, p.110.

甘冒引發第三次大戰之風險⁸²。毛澤東此言，無疑是鼓舞北韓南侵。

另一方面，史達林在金日成首度提出南侵構想時，雖曾以北韓實力不足以及時機未成熟而加以拒絕，但其後卻透過駐平壤大使館與軍事顧問團協助北韓強化戰力，並且參與作戰計畫之擬定。最後，史達林以必須事先獲得中共支持之附帶條件，承認金日成發動戰爭。而毛澤東雖然對此一決定感到訝異，但仍承諾給予支持。毛在接見金日成時即表示，如果美國介入的話，中共將派遣部隊援助北韓。毛解釋稱，蘇聯與美國有 38 度線共識之束縛，不方便參戰。但是，中共不受此約束，可以代蘇聯出兵參戰⁸³。

其次，史達林於 10 月 5 日敦促中共參戰之電報上，除了在武器裝備與彈藥之提供上完全滿足中共之要求外，並做出如下之承諾。

第一，美國儘管沒有做好大戰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不惜一戰。如此一來，中國將會被捲入戰爭，而與中國締結同盟條約之蘇聯也將被捲入。但是，不必對此感到害怕。因為我們聯合起來，將比美英更為強大。

第二，如果戰爭無可避免，現在就爆發，比數年後才爆發來得好。因為數年後，日本軍國主義將會復活，並且成為美國的同盟國。屆時，美日將會在亞洲大陸擁有由李承晚統治下的全朝鮮之橋頭堡⁸⁴。

對此，毛澤東在 10 月 13 日給史達林的回電上透露，蘇聯之援助與支持，是中共內部取得參戰共識之重要關鍵。毛澤東表示，「以前我們的同志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們對國際局勢、蘇聯的軍事援助、以及空軍之空中掩護等問題還不明確，而現在這些問題都已經明確了」⁸⁵。

從中蘇兩國對北韓之承諾，以及史達林敦促中共參戰時所做之承諾看，中共、蘇聯以及北韓等三國，雖無三國同盟之名，卻有三國同盟之實。日本學者小此木政夫即分析指出，從前蘇聯機密文書所記載有關共產陣營準備戰爭之實際狀況來看，該毛澤東、史達林、金日成等三國首腦間具有明確的「共同意思」存在⁸⁶。

⁸² 同註 2，沈志華，上冊，No.111，頁 381-382。

⁸³ A.V. トルノフ，前揭朝鮮戰爭 謎 真實，頁 111-113；和田春樹，前揭朝鮮戰爭全史，頁 113-114。

⁸⁴ 同註 2，沈志華，中冊，No.195，頁 581-584。

⁸⁵ 同前註，No.204，頁 597-598。

⁸⁶ 小此木政夫，「『中ソ陰謀』說の復權」，軍事史學會編集，軍事史學（第 36 卷第 1 號，卷頭語）。

五、「攻擊至上主義」之關鍵性作用

綜上所述，中共介入韓戰之變數，共可歸納出以下 8 項。

第一，以「輸出革命」為共同目標之中蘇同盟體制之特徵。

第二，美國阻止中蘇同盟「輸出革命」之圍堵政策。

第三，韓戰之爆發與美國公布杜魯門聲明。

第四，美國統一朝鮮所產生中共在中朝國境防衛上之「戰略上之脆弱性」。

第五，在美國援助與鼓舞下之反中共勢力反撲所產生之「體制上之脆弱性」。

第六，期待在朝鮮獲得軍事勝利帶來亞洲各國之「西瓜效應」(bandwagon)。

第七，為防止北韓政權垮台後所產生亞洲革命勢力之「骨牌效應」。

第八，成功地掀起「抗美援朝」之政治動員與秘密的軍事動員。

其中第 項到第 項變數，增強了中共領導人所抱持的美中戰爭無可避免之威脅認知，並且在第 項變數出現後，具體化為「三矢向心」威脅論。在此一威脅認知下，如果北韓被美國占領，第 項與第 項變數之脆弱性將會浮現。中共為了預先摘除美國威脅，決心採取攻擊戰略。中共領導人之決心，受到第 項之誘因與第 項之恐懼感所增強，並且著手實施第 項為參戰準備之動員。

此等變數，雖然都是直接或間接導致中共參戰之變數，但是，如果沒有受到「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理念之影響，中共領導人或許不會做出參戰決定。也就是說，「攻擊至上主義」在中共介入韓戰決策過程中，扮演著如同孔明祈雨之「東風」角色。

如果沒有「攻擊至上主義」之影響，中共當局或許會選擇攻擊以外之政策選項。例如，他們可投入重建國內經濟體系，以及改善內戰所殘留的政治對立關係。此一國內途徑之政策選項，可以提升新政權之向心力，直接有助於國家安全之強化。其次，他們也可採取加強中朝國境之防衛部署。此一政策選項所需之費用，威信將遠低於因參戰所遭受的損害與戰費支出。一旦北韓遭到美國占領，將提高中共對蘇聯遠東地區防衛之戰略價值。如果蘇聯因中共拒絕參戰而背棄同盟，反而有助於中共摸索改善對美關係。因為，當時美國正處心積

慮地企圖離間中蘇關係。

伍、結 論

在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中共基於「戰爭全局」之思考，決定透過參戰以迫使美軍撤離朝鮮之戰術性行動，達到在戰略上摘除仍屬萌芽階段之「三矢向心」威脅。中共在構思此一軍事行動之同時，除了先確認美國在短期內無意在亞洲進行大規模戰爭外，還採取向美國傳達無意進行全面戰爭之訊息、確保蘇聯對中共之安全承諾等預防戰爭升級之配套措施。因此，本文認為，中共介入韓戰之軍事行動，是以嚇阻為目的之「有限戰爭」——「攻擊性嚇阻」。

「攻擊性嚇阻」，雖是在「敵強我弱」之戰略環境下所實施的嚇阻，但是其武力攻擊目標，則不限定於嚇阻對象，有可能是與此事態相關、嚇阻對象之弱小同盟國家。例如，在本文所檢討的韓戰，以及發生在 1969 年的中蘇國境武裝衝突，分別是以美蘇兩大軍事強國為攻擊目標之事例。相對於此，1950 年代的兩次臺海危機，以及 1979 年的「懲越戰爭」，中共之武力攻擊目標雖是臺灣與越南，但是其嚇阻對象卻是美國與蘇聯。換句話說，「攻擊性嚇阻」之分析架構，除了韓戰之外，亦適用於解釋其他四個事例。

正值美國重新檢討圍堵政策之際，北韓在中蘇兩國支持下，發動了被視為是社會主義陣營對外擴張之韓戰。當美軍介入以援助南韓時，反被中共指控是過去日本經由朝鮮侵略中國政策之翻版。但實際上，杜魯門政府為避免中共誤判情勢，不但讓在臺海巡弋之美軍第七艦隊堅持守勢，且拒絕國府派兵參與韓戰。事實證明，所謂「三矢向心」威脅論，只是中共領導人誤用「歷史教訓」之結果。其次，中共領導人認為，共軍既然能夠在國共內戰中以弱勝強，在未來的對美戰爭，最終亦將可迫使美軍自朝鮮撤退。但事實證明，此一樂觀想法，源自於對本身軍事實力過度自信之錯誤計算。

許多戰爭研究學者均主張，「大多數戰爭的爆發，都是由於決策者誤判形勢，以及誤解對方意圖所導致」。經過本文以上之分析結果可獲知，中共領導人在決定介入韓戰之決策過程當中，不但因為誤用「歷史教訓」而誤解美國對亞洲政策之意圖，還誤判敵我形勢，認為共軍最終可以趕美軍下海。因此，本研究再度證明了此一主張之正確性。